

分类号: F830

单位代码: 10363

密 级: 公开

学 号: 2211010111

题 目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

英文并列

题 目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学生姓名: 曹雪儿

校内导师: 方永胜 教授

校外导师: 潘福根

专 业: 金融

研究方向: 财政金融

论文答辩日期: 2024 年 5 月 29 日

安徽工程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我恪守学术道德，崇尚严谨学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明确注明和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及成果的内容。论文为本人亲自撰写，我对所写的内容负责，并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曹雪心

日期：2024 年 5 月 29 日

安徽工程大学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或借阅。本人授权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密 ☐，在 _____ 年解密后适用本版权书。

本学位论文属于

不保密 ☒。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曹雪心

日期：2024 年 5 月 29 日

指导教师签名：孙胜

日期：2024 年 5 月 29 日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

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为当前阶段我国的“三农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从该战略提出至今，一直是我们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就目前乡村经济的发展状况来看，依然存在着发展动力不足，发展方式单一等问题。当前，数字技术发展迅猛，充分应用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兴起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拓展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广度和深度。在传统金融服务中处于劣势地位或无法享受金融服务的弱势群体，也能通过数字普惠金融享受到低成本和便捷的金融服务。当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延伸并覆盖到农村地区时，便能够对乡村振兴的实现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普惠性的特点，创新金融产品，打造符合乡村的金融服务模式，促使资源向农村经济较为落后的区域倾斜，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源关注并流向“三农”。目前对于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研究多聚焦于省级面板数据，关于数字普惠金融是否能够有效促进乡村振兴发展，以及其具体如何发挥作用，仍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故本文在对前人研究进行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相关理论以及二者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系统梳理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选取长三角 41 个城市 2014-2021 年 8 年的数据为样本，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对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

进行探讨，从乡村振兴发展的五大核心要求出发，构建出一套科学合理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用熵值法测度得到各城市的乡村振兴指数，通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以及门槛效应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得出结论如下：（1）2014-2021 年间长三角 41 个城市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良好态势，但在三省一市间存在较大差异。（2）长三角 41 个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乡村振兴及其五个维度之间显著正相关。（3）两者之间存在单一门槛特征。因此，各地区可以通过加强数字化基建、完善金融征信体系、提高金融知识普及率等措施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从而促进乡村振兴的实现。

关键词：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乡村振兴，熵值法，门槛效应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ABSTRACT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for the current stage of China's "three rural issues" to provide solutions, from the strategy put forward until now, has been our party's top priority. However, in view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rural economy,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power and single development mode. At present, digital technology develops rapidly and is fully applied in various industries and fields, providing strong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rise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expanding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services. Vulnerable groups who are disadvantaged or unable to enjoy financial services in traditional financial services can also enjoy low-cost and convenient financial services through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When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services extend and cover rural areas, they can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refore,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inclusive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novate financial products, create a financial service model that conforms to rural areas, drive resources to lean to areas with weak rural economies, and guide more social

resources to pay attention to and flow to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At present, most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focus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and whether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an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how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need to be further explored.

Therefore,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summary of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well as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between them, and proposed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of this paper. The data of 4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14 to 2021 were selected as samples. This paper adopts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 to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builds a set of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level from the five core requiremen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uses entropy method to measur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dex of each prefecture-level city. The fixed effect model and threshold effect model were established to test the hypothesis.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From 2014 to 2021,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4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shows a good trend of

steady rise, but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provinces and one city. (2)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4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ts five dimensions. (3) There is a single threshold feature between them. Therefore, all regions can develop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by strengthening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mproving financial credit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penetration rate of financial knowledge so as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ao Xueer(Financial)

Supervised by Fang Yongsheng

KEY WORDS: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entropy method, threshold effect

目录

摘 要.....I

ABSTRACT..... III

第一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2 研究意义 2

 1.2.1 理论意义..... 2

 1.2.2 现实意义..... 2

 1.3 研究方法 3

 1.4 研究内容与框架 3

 1.5 创新点 5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文献综述..... 6

 2.1 相关概念介绍 6

 2.1.1 普惠金融..... 6

 2.1.2 数字普惠金融..... 7

 2.1.3 乡村振兴..... 7

 2.2 文献综述 8

 2.2.1 数字普惠金融..... 8

 2.2.2 乡村振兴..... 9

 2.2.3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 9

 2.2.4 文献评述..... 10

第三章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2

 3.1 理论基础 12

 3.1.1 农村金融理论..... 12

 3.1.2 金融排斥理论..... 14

 3.1.3 包容性增长理论..... 15

 3.2 影响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设 15

 3.2.1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 15

3.2.2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乡村振兴的门槛特征.....	17
第四章 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发展现状分析.....	18
4.1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18
4.1.1 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	18
4.1.2 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分析.....	18
4.1.3 长三角各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分析.....	22
4.2 乡村振兴发展现状.....	24
4.2.1 乡村振兴指标体系.....	24
4.2.2 数据来源.....	25
4.2.3 指数构建.....	25
4.2.4 长三角各城市乡村振兴水平测度结果及分析.....	26
第五章 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影响的实证分析.....	28
5.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28
5.1.1 模型构建.....	28
5.1.2 变量筛选与数据说明.....	28
5.2 实证结果分析.....	29
5.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29
5.2.2 相关性分析.....	29
5.2.3 基准回归分析.....	30
5.2.4 分维度回归分析.....	31
5.2.5 内生性检验.....	33
5.2.6 稳健性检验.....	34
5.2.7 门槛效应分析.....	35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38
6.1 研究结论.....	38
6.2 研究建议.....	39
参考文献.....	40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44
致谢.....	45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21 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同时也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协调、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城乡发展差距越来越大,这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背道而驰。虽然当前阶段我国农村地区已经完成了脱贫任务,但是农业、农村的发展依然存在较大的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解决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矛盾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回溯到 2017 年,党的十九大会议首次将乡村振兴战略置于国家发展的重要议程之上,自此,它便成为我们党工作的核心任务之一。此后,中共中央多次发布相关文件,强调要不遗余力地推动乡村的建设和振兴,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速,特别是要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以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的大局。

数字普惠金融首次提出于 2016 年,随后我国发布了首个普惠金融的国家级战略,这一举动标志着数字普惠金融在我国全面开启。数字普惠金融是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和 AI 算法等现代技术而逐渐崭露头角的一种金融形态。信息技术的持续进步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数字化支付体系成为了“云生活”模式得以顺利运转的关键技术支持,同时互联网银行、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等金融组织在小微企业的复工复产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进一步推动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深入发展。2021 年 12 月,“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要全方位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建设与发展工作,鼓励金融机构推出与农业农村相关的金融产品,提高金融科技实践成果在乡村的应用率,强调了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对推动农村地区发展的积极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现代经济体系中的一股新兴力量,是金融科技与传统普惠金融融合创新的结晶。它的诞生极大地缓解了传统金融中存在的排斥现象,为广大金融服务需求者打开了方便之门。农村地区长期以来是金融资源匮乏的地区,传统金融机构考虑到成本和效益的问题,无法有效满足农村发展的需求。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了金融服务的成本、提高了获取金融服务的便捷性,促进了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优化升级。因此,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相关关系,

明晰二者之间的影响机制，对于推动新时代农村的减贫脱贫工作、促进城乡之间的均衡发展、以及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三农”领域，均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1.2 研究意义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数字普惠金融已逐渐成为驱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其在乡村振兴中扮演的角色也愈发重要。数字普惠金融极大地提升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可及性，有效弥补了传统金融服务在农村地区的不足，有力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现代化进程。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的广泛普及和应用，农村地区的经济、文化等随着资金的涌入发展进一步加快，逐渐跟上城市的步伐。这一趋势将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坚实的支撑，进一步促进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深入研究和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对地方政府推动实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2.1 理论意义

从理论层面出发，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两者之间的紧密关联，并为相关理论体系的完善提供有力的支撑。尽管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自提出以来，已经吸引了众多学者围绕其对社会治理和增收减贫等方面的影响展开广泛研究，但在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具体影响方面，现有的研究仍显不足，需要进一步充实和深化。本文以长三角 41 个城市为研究样本，结合相关文献和区域实际情况测度了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指数，并运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其的影响，进一步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1.2.2 现实意义

从现实层面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大力发展对农民和农村经济具有多重积极影响。首先，农民能够更便捷地获取金融服务，这不仅降低了交易过程中的成本，还提升了资金使用的效率，这种便利性极大地激发了农村经济的内在活力。其次，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和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关键

作用。通过提供个性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它帮助农民扩大生产规模，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进而促进农村产业的优化升级。同时，数字普惠金融还能引导社会资本更多地流向农村地区，促进拓宽农村地区的融资渠道，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此外，随着数字普惠金融覆盖面在农村地区的延伸，农村的发展速度将逐渐与城市趋同，有助于实现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研究清楚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之间的内在机理，对于现实工作有一定指导意义。

1.3 研究方法

本文依据 2014-2021 年长三角地区的相关数据，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深入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影响。具体方法如下：

（1）文献研究法。本文广泛搜集并系统整理了关于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研究成果，通过深入研读和归纳总结，明确了当前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取得的主要成果。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联，初步构建了本文的研究框架，为后续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定性分析和定量研究法。本文首先进行了定性分析，通过广泛搜集和整理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相关资料，包括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等，深入了解了两者的发展特点与现状。接着，本文又进行了定量研究，采用熵值法、固定效应模型等科学方法，对相关变量进行了实证研究，旨在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相关关系，为后续深入研究提供有力支撑。

（3）实证分析法与规范分析法相结合。本文首先进行实证分析，选取了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 2014-2021 年间数据为样本，运用熵值法构建了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指数，并结合相关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随后，本文进行了规范分析，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细致的解读并得出研究结论，针对研究结论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出台提出建议。

1.4 研究内容与框架

本文以长三角 41 个城市为例，构建了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

深入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联。进一步地，本文引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门槛变量，详细研究了两者之间的门槛特征。全文内容分为六个章节。

第一章：绪论。首先结合当前实际发展状况对文章的研究背景作出了大致介绍，下一步对本文研究意义进行了阐述。随后，分点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并对全文的章节内容、研究思路以及整体框架进行了梳理。最后，指出了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为后续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

第二章：相关概念与文献综述。本章首先界定了研究主体的概念。接着，深入剖析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究思路和结论，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本质。最后，结合个人的思考和理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方向。

第三章：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首先阐明本文涉及到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农村金融理论、金融排斥理论以及包容性增长理论等。其次，结合相关理论对本文研究主体进行理论分析，接着结合理论分析部分梳理研究主体的影响路径，最后提出研究假设。

第四章：发展现状分析。本章内容主要是对两个研究主体的发展现状进行探讨。首先，详细剖析了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及特点。其次，构建长三角地区的乡村振兴指标体系，通过对计算得出的指数进行分析以了解该区域乡村振兴的发展状况。这两部分内容能够帮助我们初步了解长三角地区两个研究主体的发展趋势及差异。

第五章：实证分析。本章包含的主要内容有：（1）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先根据国内外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以相关理论为依据，构建实证模型，再阐述数据来源以及控制变量选取依据；（2）实证分析，首先对变量数据进行统计性分析，然后将变量代入相关模型之中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模型包括固定效应模型与门槛效应模型，以此来验证研究假设。

第六章：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首先对前文研究结论进行总结，然后基于实证结果对如何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 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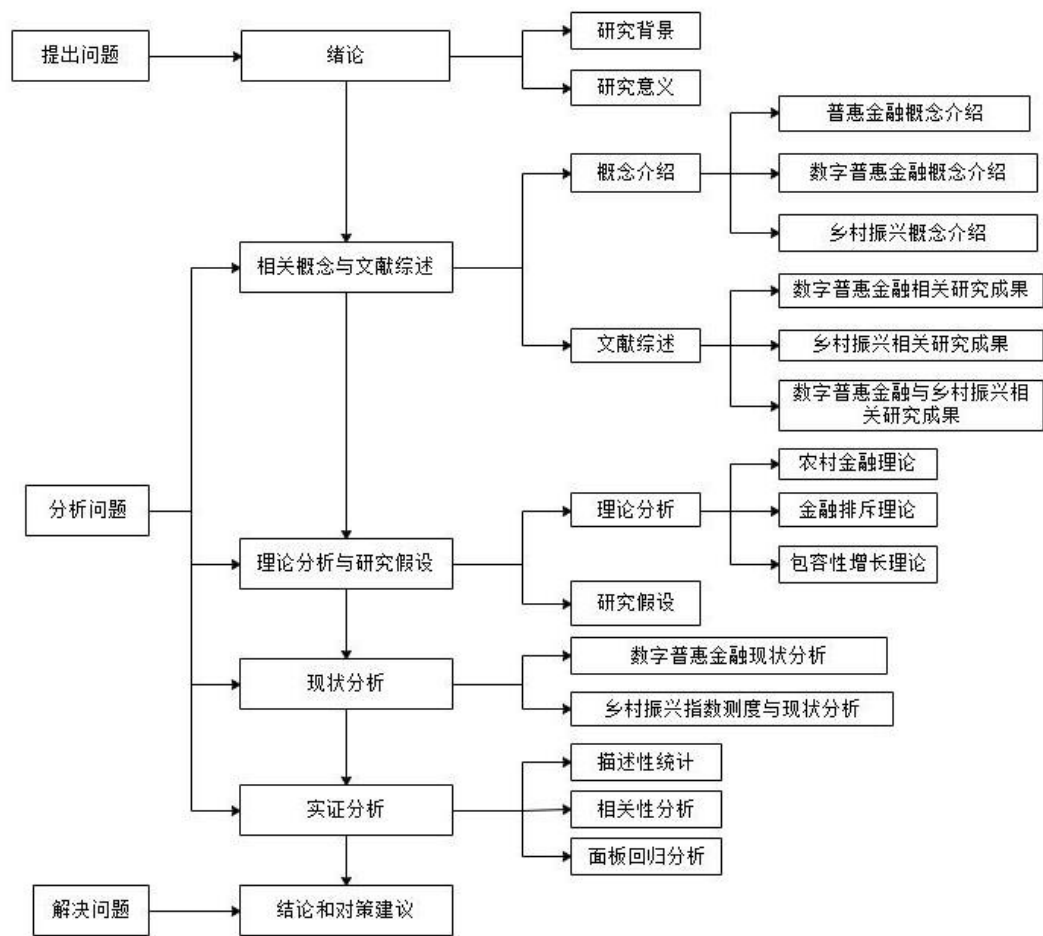


图 1-1 研究框架图

1.5 创新点

第一，以往的研究大多数以理论分析为主，侧重于梳理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缺乏数据和模型支撑，本文运用相关样本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进行定量研究，理论和实证相结合更具有参考意义。同时，本文在指标体系构建时结合该区域实际状况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创新，希望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二，样本数据的选取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目前对于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研究多聚焦于省级面板数据，本文选取 2014 年至 2021 年长三角 41 个城市近 8 年的数据，并建立了乡村振兴及其五个维度的发展水平指数，通过实证得出研究结论，极大地丰富了该领域在城市层面的研究成果。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文献综述

2.1 相关概念介绍

2.1.1 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的明确概念在本世纪初由联合国提出，与传统金融不同之处在于，其以合理可控的成本，为金融需求不同的社会群体提供与其需求相匹配的金融服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在定义中特别强调了普惠金融应向在传统金融服务中处于弱势地位或享受不到金融服务的人群倾斜，如乡村小企业以及农民等。普惠金融在中国推行以来，得到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多次在政策中提出并大力推行普惠金融的实施。2013年11月，我国正式踏上了普惠金融的发展之路。2015年，随着相关政策的发布，普惠金融的定义在我国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它指的是在成本可控的前提下，最大化的满足各类人群的金融需求。这种服务致力于让更多人享受到金融服务的便利，从而推动社会的公平与进步。周小川（2015）^[1]提出普惠金融是能够满足各类人群需求的价格合理的多种金融服务，该服务具有及时、有尊严、方便、高质量的特点。邢乐成（2019）^[2]提出普惠金融服务的定价范围要合理，不能打破市场的供需平衡以及商业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普惠金融的目标之一就是解决金融排斥问题。William（2006）^[3]认为普惠金融能够帮助增收减贫，对实现包容性社会具有积极作用，且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金融排斥问题，它的提出对正在进行金融深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在此之前，小微企业、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由于金融抑制的存在，经常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金融服务，从而制约了他们的发展。星焱（2016）^[4]提出农户、小微企业等在传统金融资源错配中享受不到金融服务的群体是普惠金融服务的主体用户。普惠金融的提出弥补了金融体系的缺陷，很好地满足社会各阶层群体的金融服务需求。

2.1.2 数字普惠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是借助数字技术推动金融服务的革新，旨在实现金融服务的更广泛、更公平和更高效的普及。通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在横向和纵向均得到了拓展，成本和门槛有所降低，使得更多用户群体能够受益。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内涵，贝多广（2017）^[5]指出它以数字信息技术和移动通讯终端为技术支撑，能够更好地满足广大用户的需求。宋晓玲（2017）^[6]认为以数字技术驱动形式实现的普惠金融就是数字普惠金融，她提出应充分发挥我国在电子商务和电子支付技术领域的优势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以期有所成就。

数字普惠金融以其便捷、高效等优势，成为推动金融服务普及和优化的重要力量。它使得金融服务能够更快速地响应市场需求，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同时，数字普惠金融也促进了金融服务的智能化和个性化，满足不同用户群体的多样化需求。数字普惠金融的实现方式主要包括建立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体系，利用大数据和金融科技技术来推动金融服务的普及和发展。例如，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建立大数据风控体系，可以更准确地评估借款人的信用状况，降低贷款风险；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构建高效的金融科技体系，能够更有效地整合金融资源，为金融服务提质增效。简而言之，数字普惠金融是一种以数字技术为支撑，能有效满足现代化发展需要的金融模式，它使金融服务更加便捷、普惠和公平。这不仅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还能改善金融服务的质量，进一步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健发展。

2.1.3 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已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但总体发展水平差异化明显，乡村地区发展状况相比城市来说还有很大差距，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利于缩小这种差距。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按照五维度总要求，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完善相关政策体系，以农业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为重点。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方式影响巨大。上个世纪 50 年代，我国重工轻农、重城市轻农村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虽在带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方面见效明显，但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发展不均问题，长此以

往农村整体落后的状况反而成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自 90 年代起,我国政府为改善农村状况,开始实施以工补农的城乡统筹战略和以工促农、以城促乡的城乡一体化战略,然而这些举措并未根本解决城乡发展不均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我国二元城乡社会经济结构走向一体化提供了新的方向。同时,这一战略也转变了过去单纯注重大城市发展的城市化战略,转而关注大中小城市体系的协同发展。这极大减轻了当前大城市生态资源压力和沉重的社会负担。因此,将乡村振兴战略贯彻到底是我国实现百年奋斗目标重要一环,是我国全面振兴规划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2.2 文献综述

2.2.1 数字普惠金融

自数字普惠金融被大众熟知以来,众多学者也积极投身于对它的研究当中。Shiller (2013)^[7]提出降低农村贫困水平的方法之一就是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因为它在降低农民以及农业经营者的使用成本方面效果显著。Ozili (2018)^[8]将研究视角放在了数字金融是否影响金融包容和稳定上,并得出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为了保证信息安全,需要加强监管,以期更好地达到包容性增长的目的。

在国内,尹应凯等(2017)^[9]阐述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逻辑背后所体现的目标,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不同模式和“中国贡献”。陈婵姘(2018)^[10]采用计量模型实证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在缩小城乡差距,助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会带来房价上涨的风险。邱兆祥和向晓建(2018)^[11]要利用好数字普惠金融降本增效的优势为普惠金融发展添砖加瓦,但需注意发展初期存在金融欺诈、缺乏监管等现象。董玉峰等(2020)^[12]为未来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明了新方向,即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中,此举有助于提升落后地区的金融服务水平,缩小其与发达地区在金融资源方面的差距。任海军(2021)^[13]通过测算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指数,实证得出西部地区由于技术发展相对落后,导致数字普惠金融效率改善难度加大。陈婕(2021)^[14]在研究中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深入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任太增（2022）^[15]的研究则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随着经济包容性的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2.2.2 乡村振兴

国外学者对乡村振兴的研究起步较早，大多集中于乡村建设与发展两个方面。Johnson（1989）^[16]认为资金在农村振兴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应当运用金融手段解决资金问题。Kawate（2005）^[17]提出乡村振兴有两个重要主题，一是农村复兴，二是改革组织。Ojo 和 Hairul（2013）^[18]研究发现许多国家实行乡村振兴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乡村衰退问题。McLaughlin（2016）^[19]创新研究视角，从全球治理和农村发展两方面研究如何促进乡村振兴。Liu 和 Li（2017）^[20]提出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同步发展是抑制乡村衰退的一个重要方法。

国内学者张海鹏（2018）^[21]不仅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渊源、创新点等进行了探讨，而且对其实现路径进行了清晰的阐述，他认为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是漫长的，并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推进乡村综合改革等措施为实现乡村振兴打好基础。马义华和曾洪萍（2018）^[22]将乡村振兴的内涵价值以及如何推进乡村振兴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并指出了重点突破方向。黄祖辉（2018）^[23]强调了准确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即在实施过程中需要结合区域实际情况，统筹协调发展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王修华（2019）^[24]指出一个多元化的金融体系能有效解决农村金融资源错配问题，进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谭燕芝（2021）^[25]创新研究方法，运用偶和协调模型测算时空耦合协调状况，发现区域发展协同能力越高，空间联动效应越强，越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王姗姗（2022）^[26]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收入不平等、乡村振兴水平以及农民幸福感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乡村振兴在提升农民幸福感方面的作用因地区和年龄群体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并且这种作用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效应。

2.2.3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

自乡村振兴和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以来，陆续有很多学者针对二者之间的影响机制和实现路径等进行研究。国外学者关于二者之间关系的探究成果并不多。Beck 和 Brown（2011）^[27]创新研究视角，从农村家庭的

角度出发，重点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是否能够对农村发展产生影响，结果显示在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及社会空心化问题等导致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初期其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发展成熟之后，促进作用就会越来越明显。

相较而言，国内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更为丰富。例如，蔡兴和蔡海山等（2019）^[28]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能够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且存在地区差异性。李季刚和马俊（2021）^[29]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无论是从纵向数字化程度还是横向覆盖广度来看，都影响着乡村振兴的实现。李丽丽（2022）^[30]从农村电商的视角出发对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促进农村电商发展来推动乡村振兴。庞凌霄（2022）^[31]认为我国乡村振兴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促进作用的溢出效应与距离成反比。陈亚军（2022）^[32]的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在推动乡村振兴方面存在地区异质性，从具体表现来看，在东部地区最强，在中部地区次之，在西部地区最弱。周林洁（2022）^[33]基于产业发展视角指出农村金融体系发展的滞后阻碍了乡村产业的发展。傅巧灵（2022）^[34]提出完善数字化基建是推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的前提。田霖等（2021）^[35]等研究发现二者之间存在门槛效应。孟维福（2023）^[36]分析得出缓解信贷约束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方法之一，并提出了数字普惠金融地理穿透性很好，它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存在空间溢出特点。

2.2.4 文献评述

本文对学术界相关文献进行分类整理后，总结出以下结论：

（1）在与数字普惠金融相关的理论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将研究视角放在其是否能促进农村产业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以及目前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壁垒和潜在风险等方面。

（2）在与乡村振兴相关的理论研究中，国内外学者侧重点有所不同。国外学者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乡村建设与发展两个方面，国内学者大多集中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路径以及如何更好地实现乡村振兴等方面。

（3）在与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影响的理论研究中，大多数学者的研究

样本均选自国家或省域层面，缺少市域层面的研究。且数字普惠金融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历程并不长，现有研究多是以理论分析的方式进行探讨，缺乏数据和模型支撑。本文在此基础上，以长三角城市的视角，通过实证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以期能够丰富相关理论研究。

第三章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3.1 理论基础

3.1.1 农村金融理论

在现代社会，金融发展迅猛，对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村金融理论因其在金融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对乡村振兴过程中如何提供金融服务具有一定指导意义。接下来，将从农村金融理论发展历程中的三个主要部分来展开介绍。

（1）农业信贷补贴论

上世纪 60 年代，凯恩斯主义学派成为经济学界的主流，其肯定了扩张型经济政策的积极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农业信贷相关理论逐渐兴起。农业信贷补贴论指出，多数农民储蓄能力有限且农业生产风险高、周期长，无法满足传统金融机构对于其客户资产和风险规避的需求，从而导致金融服务无法延伸至该类群体。因此，该理论建议在农村金融市场中政府应采取相应政策适时发挥调节作用，提供信贷补贴和优惠政策，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具体来说，农业信贷补贴论的政策建议包括：一政府应该设立专门的农业金融机构，为农民提供低息贷款和信贷补贴，以满足他们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资金需求。二政府应该通过税收、利率等手段，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增加农村地区的金融供给。三政府还应该加强农村金融监管，确保信贷资金的有效利用和农村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

对于农村金融发展滞后地区，该理论更具有实际指导意义。政府通过干预和引导，可推动农村金融市场健康发展，提升农业生产水平，减轻农村贫困，进而促进国家经济增长。但需注意，农业信贷补贴论也有其局限性，政府过度干预可能引发市场失灵，导致金融资源错配或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同时，过度的信贷补贴也可能引发农民的道德风险和过度依赖政府等问题。因此，在实践中需要权衡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寻求一种既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又能保持金融市场效率的平衡方案。

（2）农村金融市场论

上世纪 80 年代，新古典经济学派崭露头角，并深受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这个时期，金融深化理论以 Mckinnon（1973）^[37]和 Shaw（1973）^[38]为代表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并对先前的农业信贷补贴论提出了挑战。金融深化理论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减少政府干预，让金融市场自由化发展。这一转变标志着对农村金融市场的理解和政策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

农村金融市场理论的基本前提是：首先，农民具备一定的储蓄能力，这些储蓄足以满足农村地区的发展需求，这与农业信贷补贴论中农民储蓄能力不足的论断形成鲜明对照。其次，低利率政策不仅可能阻碍农村金融的发展进程，还可能对金融机构的资金融通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市场利率应当由市场供求关系自然决定，而非受到政府的过度干预。再者，农村金融的发展应更多地依赖于内部资金的积累与有效利用，而非过度依赖外部资金的输入。同时，信贷机构的贷款回收率亦是衡量农村金融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之一。最后，农村非正规金融在金融市场中占据一定份额，其提供高额信贷主要是基于资金较高的机会成本考虑。因此，农村金融市场理论亦应重视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及其在市场中的作用。

农村金融市场理论主张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优化配置金融资源，强烈反对政府的过度干预。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政府推行的低利率政策。因此，该理论积极倡导采用灵活的利率政策、合理的信贷政策以及科学的金融发展政策等多元手段，推动农村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和市场化进程。其突出贡献在于引入了市场化机制，引领了农村金融理论的新潮流，为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然而，过度强调市场化也可能导致一些问题，如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和 risk 增加等。因此，在实践中需要找到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之间的平衡，确保农村金融市场稳健发展。

（3）不完全竞争市场论

上世纪 90 年代后，全球范围内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揭示了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和不完全性，使得金融深化理论在实践中遭遇挑战。新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完全金融市场自由化可能不利于金融发展，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和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在这种背景下，不完全竞争理论应运而生。不完全竞争理论既强

调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也提倡必要时政府应出手对市场失灵进行适度干预。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需要进行相应的政策干预来积极应对此类问题。

不完全竞争市场论对于解决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匮乏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指出金融机构在农村等偏远地区可能无法充分发挥作用。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不完全竞争市场论强调非市场因素的重要性。相关研究表明通过引入监督小组等机制，可以有效提升信贷风险防控能力，降低信息的不对称性。总体而言，该理论为当前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提出了新思路。它更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同时也保留了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使得该理论在实践中更具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

3.1.2 金融排斥理论

金融排斥理论关注的是金融系统中某些弱势群体和贫困群体被排斥在金融服务之外的现象。这一理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受到关注，学者研究主要聚焦于英美两地金融机构的地理分布特点（Leyshon 等，1993；Leyshon 等，1994；Leyshon 等，1995）^[39-41]。通过深入探讨其地理位置的影响，研究人员试图揭示金融机构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出于保障自身运营安全、提升交易质量等多重因素的考量，金融机构往往更偏向于在经济繁荣地区和高端客户群体中提供金融服务。这一现象导致了农村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网点数量锐减，从而使得部分弱势群体和贫困人群难以享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服务，被排斥在金融体系之外（Rogaly 等，1999）^[42]，这样的局面显然不利于金融服务的普及和均衡发展。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金融排斥的成因已不再仅限于地理因素。个体的受教育程度、金融素养等个体特征也会成为金融排斥的因素。这些弱势群体可能因为缺乏金融知识或技能而感到对金融服务有距离感，从而不愿意接受或难以获得金融服务。此外，金融排斥还限制了这些人群参与投资的机会，投资机会的不均衡进一步影响到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能力，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的现象。

金融排斥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提醒了我们要关注金融系统中的不平等现象，并寻求解决方案以确保所有人都能享受到金融服务带来的好处。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政府和金融机构需要采取措施来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提高弱势群体的金融素养，以及为他们提供更多参与金融市场的机会。这不仅有助于减少社会不平等，还能促进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3.1.3 包容性增长理论

包容性增长理论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它强调公平、共享、可持续性和创新，旨在确保经济增长的益处能够广泛惠及所有人群，而不仅仅是少数人或特定阶层。这一理论是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反思和超越，它不再单纯追求 GDP 数字的增长，而是更加注重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

包容性增长的实现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政府不仅需要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加大对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投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机会和保障。同时，政府还需要加强对企业的监管，防止市场失灵和社会不公，确保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够公平分配。企业在以盈利为目的的同时也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通过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企业可以为实现包容性增长做出贡献。社会各方，包括媒体、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和公众等，应该加强对政府和企业行为的监督，推动信息公开和透明度，保障公平和正义。同时，各方还需要加强合作与沟通，共同推动包容性增长的实现。包容性增长不仅能解决贫困与不平等问题，还能推动各方协同共治，提升社会现代化治理能力。

3.2 影响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设

3.2.1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把创新作为落脚点，以减少服务成本、加大服务范围的方式，为农村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做出了有力的贡献，促进了乡村振兴战略部署的落地和实施。数字普惠金融从五个维度促进乡村振兴。

第一，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一是提高资源利用和分配效率。数字普惠金融融合数字技术和金融资源为一体，从技术端减少服务成本，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农村地区，整合各类要素禀赋，因地制宜发展农旅融合等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二是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依托互联网技术，在农村

地区打造互联网金融平台，为农田水利建设、农业产业发展提供配套金融服务（李文瑞等，2021）^[43]。同时，利用互联网宣传面广、受众多的特点来广铺销售网，打造产业链，推动农村地区业态升级，创造就业岗位，提升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夯实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

第二，促进乡村生态宜居。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引入资金构建现代化农业发展体系，运用科学的手段管理农业生产，建立低碳型农业生产方式（程秋旺等，2022）^[44]，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保障了农业效益。另一方面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得益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资金支持，极大地改善了乡村环境，提高了宜居性。

第三，助力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村低收入家庭提供助学贷款等便捷服务，有效减少了因贫辍学的现象，为农村孩子接受教育提供了资金保障。同时，资金流入带动文化下乡，极大促进了村民精神文明建设，推动乡风文明的实现。

第四，促进乡村有效治理。数字普惠金融能减轻老年人口的多维贫困（陈平等，2022）^[45]，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升城乡居民收入（王正新等，2021）^[46]。它通过构建乡村治理体系，推动乡村治理工作与乡村产业经济协调发展，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建立起完善的农村金融信用体系。该体系有助于形成良好的乡村管理秩序，实现有效的乡村治理，并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支撑。

第五，帮助实现生活富裕。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供优质金融信贷服务，鼓励居民就业创业，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刺激农村经济活力，增加就业岗位，引导村民返乡就业（李晓园等，2021）^[47]，改善农民收入（朱一鸣，2020）^[48]，有助于实现生活富裕的目标。其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如图 3-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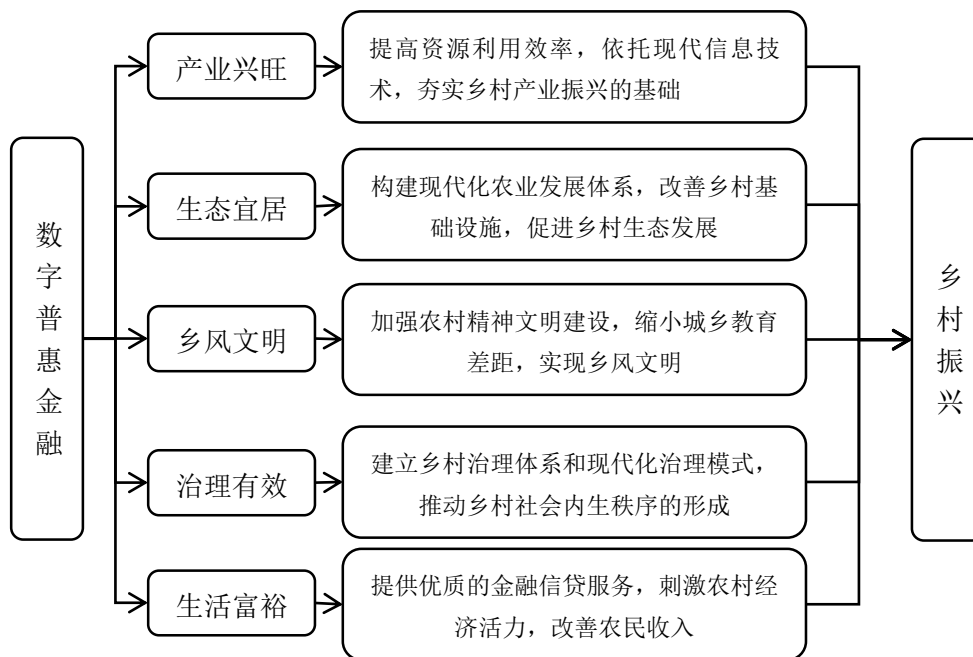


图 3-1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

综上，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越高，乡村振兴水平越高。

3.2.2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乡村振兴的门槛特征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乡村振兴带来了新的机遇。我们需要精准施策，持续努力，借助数字普惠金融工具，将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具体行动，将惠民政策转化为实际操作，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受到乡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等基础条件的影响。其服务也并非越多越好，关键在于能否满足农村居民低成本、便捷化的融资需求。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对象是全体农村人口而非特定群体，由于农民的文化、收入和风险承受能力各异，其接受度也有所不同，进而导致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会受到影响。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H2：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与乡村振兴的影响效果之间存在门槛效应。

第四章 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发展现状分析

4.1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4.1.1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自数字普惠金融在中国发展以来，我国数字技术应用规模增长趋势明显，电子商务与移动电子支付发展迅猛，网上支付用户规模自 2011 年的 2.92 亿起显著增长。不过，数字普惠金融因发展时间较短，数据收集面临挑战，尚未形成成熟的衡量体系。学者们使用较多的是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如图 4-1 所示，其从三个方面较为全面准确地反映当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状况，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参考价值。因此，本文将以该指数为依据，展开后续的现状与实证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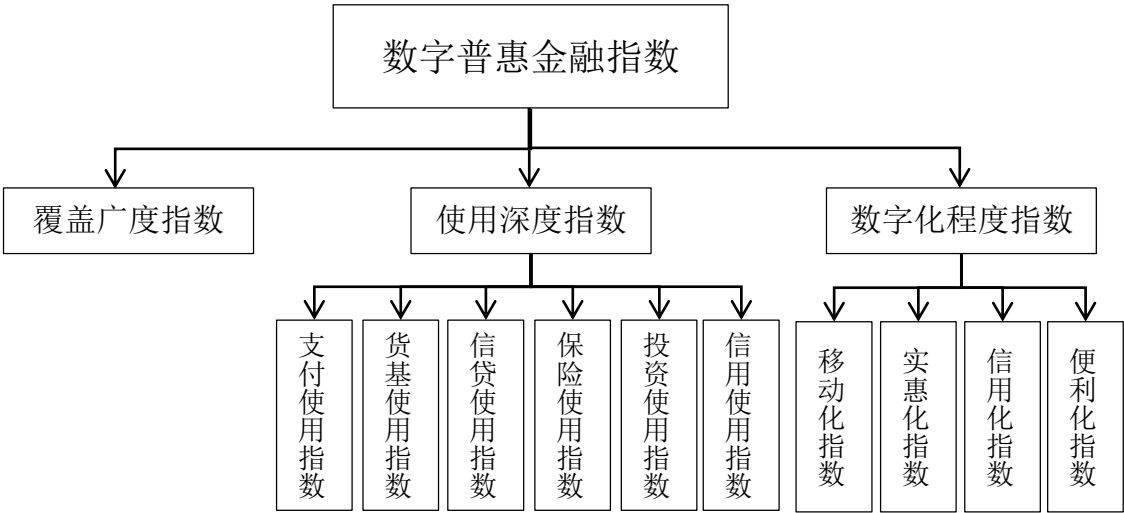


图 4-1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框架图

4.1.2 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分析

（1）长三角三省一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情况分析

本文汇总了 2014-2021 年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并将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发展情况与全国各省份的平均水平进行了对比，绘制了相应的趋势对比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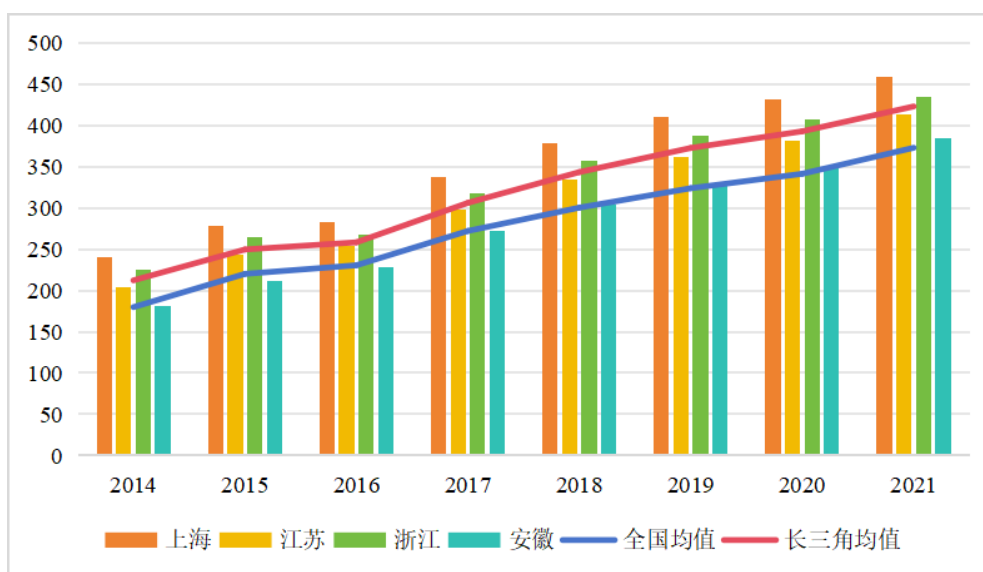


图 4-2 2014-2021 年长三角三省一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趋势对比图

图 4-2 清晰地呈现了 2014-2021 年长三角三省一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全国平均值的对比情况。在这八年里，该指数全国均值呈稳步增长趋势。2014 年全国均值是 179.75，到 2021 年翻了一番，其中 2015、2017 和 2018 年增长速度均超过了 10%，分别为 22%、18%和 10%。其他年份也有所增长，但增速较为缓慢。

此外，从图 4-2 可以发现 2014-2021 年长三角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均值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增速趋势与全国均值发展趋势相近。主要原因在于长三角地区与数字普惠金融相关的技术起步时间较早，优越的经济发展政策和坚实的金融基础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对比来看，上海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要领先于其他三个省份与全国均值。自上世纪以来，上海就走在我国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前列，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较好的工业化基础。上海政府自 2001 年开始对信息化战略作出部署，此后数年间又陆续出台多项政策大力发展大数据以及数字经济。现代化基础较好加之长期的政策推动，使上海市成为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安徽是农业大省，较其他两省一市来说，发展相对落后，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其他地区。但近年来，安徽加大了数字普惠金融建设力度，不断完善数字化基建，依托信息技术多渠道推进金融服务普惠力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趋势向好，近年来指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增速较快，充分发挥出了数字普惠金融于小微企

业、偏远地区、贫困群体的支持作用。

(2) 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三维度的分析

对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的三个二级指标进行分维度分析，进一步探讨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的发展状况。

1. 覆盖广度指数分析

对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见图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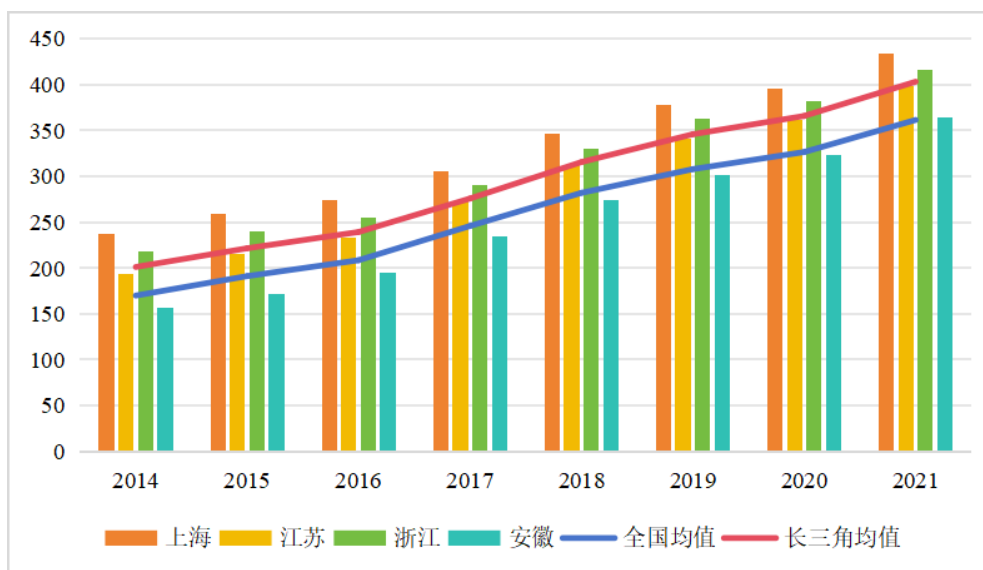


图 4-3 2014-2021 年长三角三省一市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发展趋势

从图 4-3 可以看出，8 年间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覆盖广度均值增长趋势较为平稳，增速区间保持在 5%-18%，可见该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发展态势良好。2021 年三省一市的覆盖广度指数较 2014 年都增长了一倍左右。其中上海的覆盖广度指数在 8 年间一直保持领先地位，江苏和浙江次之，且均高于全国均值。这与这些地区良好的互联网发展环境以及绝对的移动支付优势息息相关。安徽省近年来加大追赶力度，不断提高数字技术发展水平，逐步扩大覆盖广度指数，逐渐赶超全国平均水平。

2. 使用深度指数分析

对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指数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见图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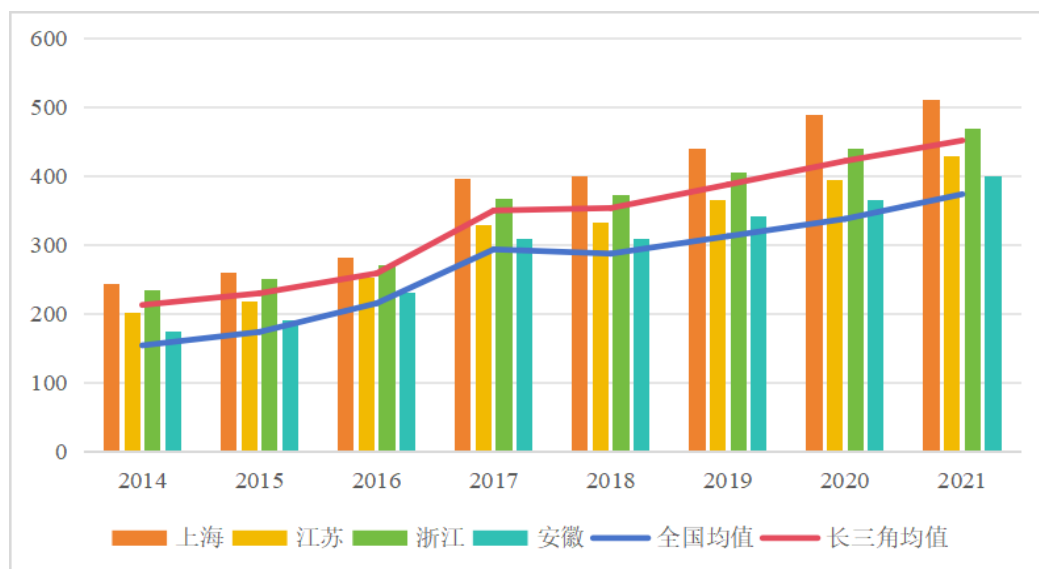


图 4-4 2014-2021 年长三角三省一市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指数发展趋势

由图 4-4 可以看出，8 年间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整体呈现平稳增长态势，2018 年略有波折，主要原因是国家为了优化互联网金融市场环境，加强了金融监管力度，对不规范金融产品进行整改下架，导致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受到波及，一些以信贷、投资为主的金融产品的使用深度有所下降。此后三年，市场环境在整改后得以改善，市场秩序恢复，使用深度指数发展稳中向好。在 2014-2021 年，上海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指数在三省一市中始终排名第一，主要原因在于上海在这期间保险业务发展如日中天，信贷业务、投融资业务以及货币基金发展也有质的飞跃，因此其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指数保持第一实至名归。

3. 数字化程度指数分析

对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指数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见图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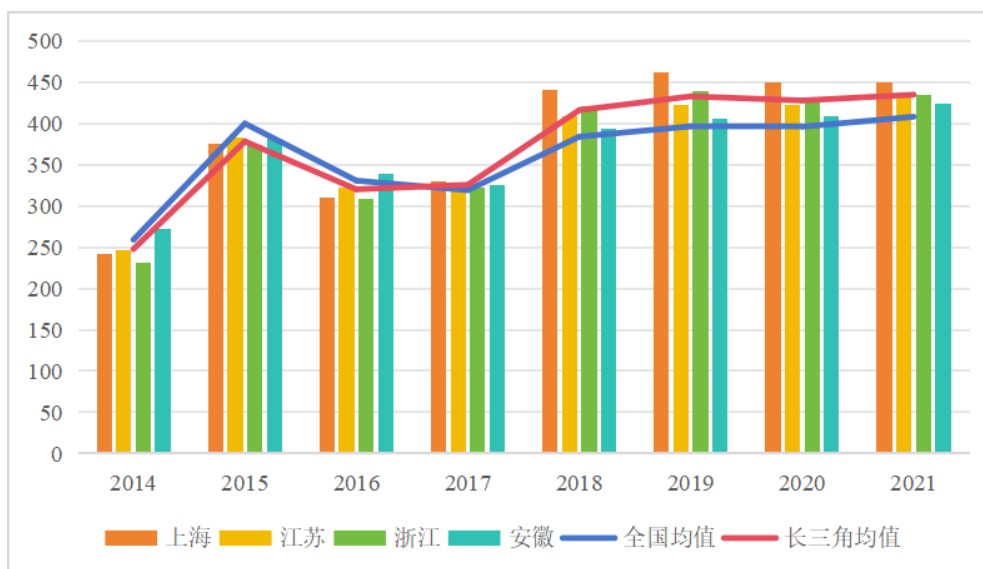


图 4-5 2014-2021 年长三角三省一市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指数发展趋势

图 4-5 显示，8 年来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的数字化程度指数整体呈增长趋势。2021 年长三角均值较 2014 年增长了 75% 左右，高于全国均值的增长幅度。但 2016 年较 2015 年长三角地区数字化程度指数有明显下降，这与前期我国数字化技术发展速度较快，到 2016 年发展逐渐平缓有关。与数字普惠金融另外两个维度相比，长三角地区数字化程度指数在 2017 年以前均低于全国均值。2018 年开始，长三角地区加强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数字化程度指数反超全国均值，并在之后一直保持领先。2014 年长三角三省一市数字化程度指数安徽排名第一，到 2017 年被上海反超之后增长后劲不足。可见三省一市中总体增速上海名列前茅，安徽的数字化程度发展速度还有待加强。

4.1.3 长三角各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分析

以长三角各城市 2021 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依据绘制图 4-6，以便更好地对比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及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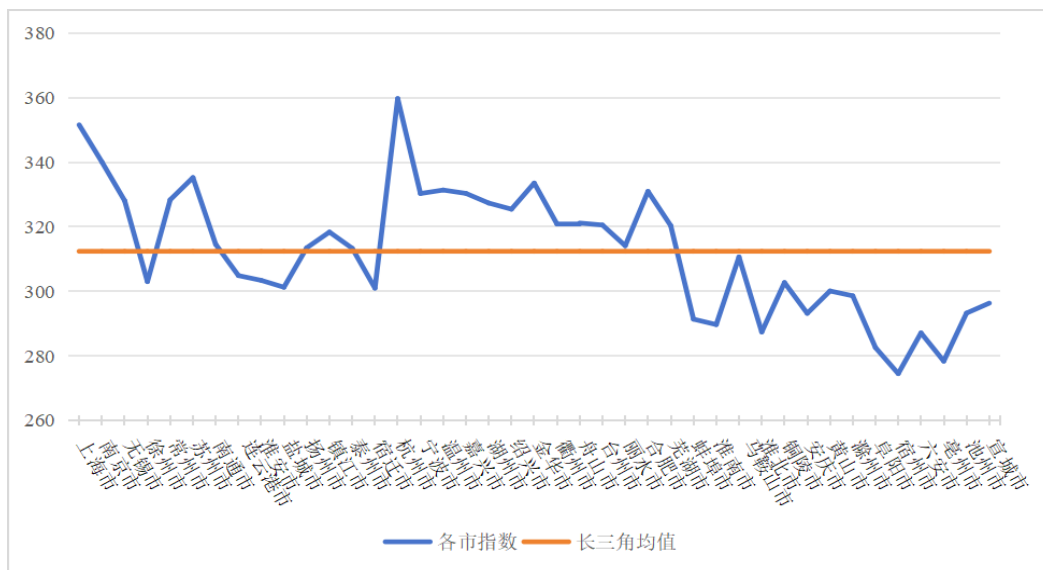


图 4-6 2021 年长三角 41 个城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观察图 4-6 可知，2021 年长三角 41 个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性较大。整体上看，浙江省各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均高于长三角均值 312.39，且杭州市在长三角地区排名第一。这离不开浙江优越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环境与良好的经济发展状况，杭州的电子商务起步早，发展状况欣欣向荣，带动了该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上海和江苏两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也很出色，值得各地区学习。相较而言，安徽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不容乐观。16 个城市中仅有两个高于长三角均值。这主要是因为安徽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长三角其他地区，金融发展环境有待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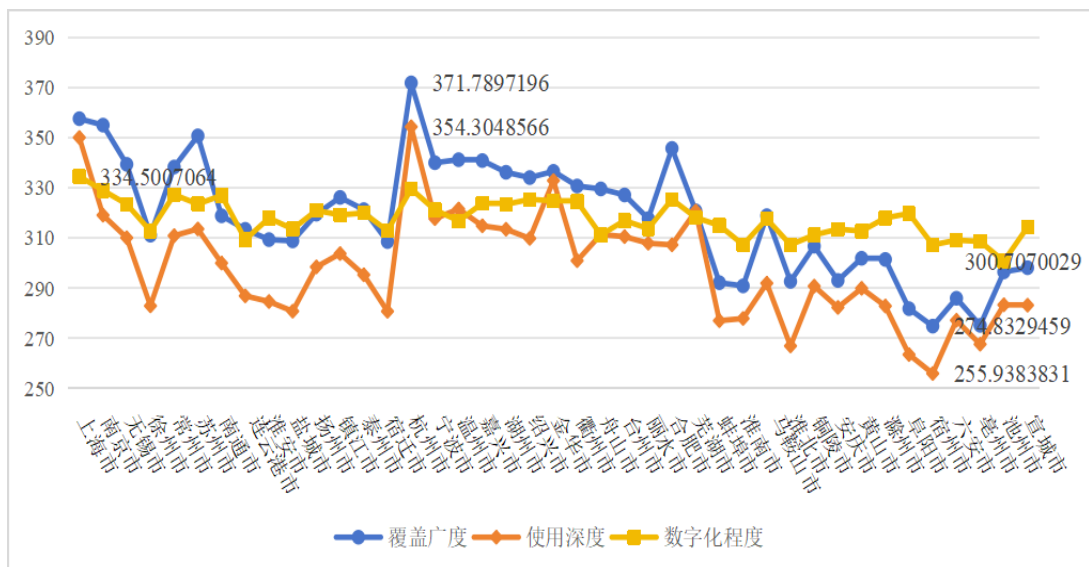


图 4-7 2021 年长三角 41 个城市数字普惠金融三维度指数

从上图 4-7 可知，2021 年三个维度中，数字化程度指数整体波动幅度较平

稳，说明其发展情况在各市间的差距较小，而另外两个维度波动幅度较大，各市间的差异较明显。当年覆盖广度的最大值为杭州的 371.79，相较于最低值宿州的 274.83，高了近 35%；使用深度最大值为杭州的 354.30，相较于最低值宿州的 255.94，高了近 38%；数字化程度最大值为上海的 334.50，相较于最低值池州的 300.71，高了仅 11%。可见另外两个维度相较于数字化程度的差异性更明显。其中使用深度的差异性近几年也有所降低，这也是各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差异有所缩小的原因之一。因此各地区要抓住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性特征，向杭州、上海等地学习，加大互联网发展力度，加强居民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倾向及对多样化的数字金融产品的接受度和使用度，切实提升用户的体验感和用户粘性，争取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状况更上一层楼。

4.2 乡村振兴发展现状

4.2.1 乡村振兴指标体系

乡村振兴战略自提出以来就得到了各地区各部门的高度重视，成为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广大学者也开始将目光转向对乡村振兴的研究，以推动战略的有效实施。对于乡村振兴评价指标的确定，学术界莫衷一是。本文通过阅读已有文献（毛锦凰等，2020；张挺等，2019；李长亮等，2022）^[49-51]，从五个维度设置一级指标，一级指标下根据已有文献和数据可获得性共设置十四个二级指标，具体内容如表 4-1 所示：

表 4-1 乡村振兴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产业兴旺	农业生产效益（万元/人）	乡村人均农林牧渔产值
	农业产业化水平（千瓦时/人）	乡村人均农村用电量
	农业机械化水平（千瓦/公顷）	每公顷农作物农业机械总动力
生态宜居	化学物质投入强度（吨/公顷）	每公顷农作物农用化肥施用量
	绿化程度（平方米/人）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环境治理水平（%）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乡风文明	师资力量（人/千人）	每千人专任教师数

续表 4-1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治理有效	教育覆盖水平（人/千人）	每千人在校学生数
	全民阅读水平（册/百人）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量
	城乡收入差距（%）	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之比
	城乡消费差距（%）	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之比
	农村医疗卫生发展水平（人）	乡村每千人医生数
生活富裕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元/人）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

4.2.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选取范围为 2014-2021 年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实证所用的被解释变量由表 4-1 所示指标体系构建得出，相关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缺失数据已通过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实证所用的解释变量数据由北大研究团队构建得出。

4.2.3 指数构建

本文采用熵值法（蔡雪雄等，2021）^[52]对长三角各城市乡村振兴指数进行测度，这种方法基于指标的信息熵计算，能有效避免主观因素的干扰，从而更准确地衡量各城市的乡村振兴指数。具体过程如下：

（1）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
$$X_{ij} = \frac{X_{ij} - X_{\min}}{X_{\max} - X_{\min}} \tag{4.1}$$

负向指标：
$$X_{ij} = \frac{X_{\max} - X_{ij}}{X_{\max} - X_{\min}} \tag{4.2}$$

（2）计算第 j 项指标第 i 年份指标值的比重：

$$P_{ij} = \frac{X_{ij}}{\sum_{i=1}^n X_{ij}} \tag{4.3}$$

（3）计算各指标的熵值：

$$e_j = -\frac{1}{\ln(n)} \sum_{i=1}^n P_{ij} \ln P_{ij} \quad (4.4)$$

(4) 根据熵值计算得到评价指标权重:

$$w_j = \frac{1 - e_j}{\sum_{j=1}^m (1 - e_j)} \quad (4.5)$$

(5) 测算得到各城市乡村振兴指数:

$$Rural_i = \sum_{j=1}^m w_j X_{ij} \quad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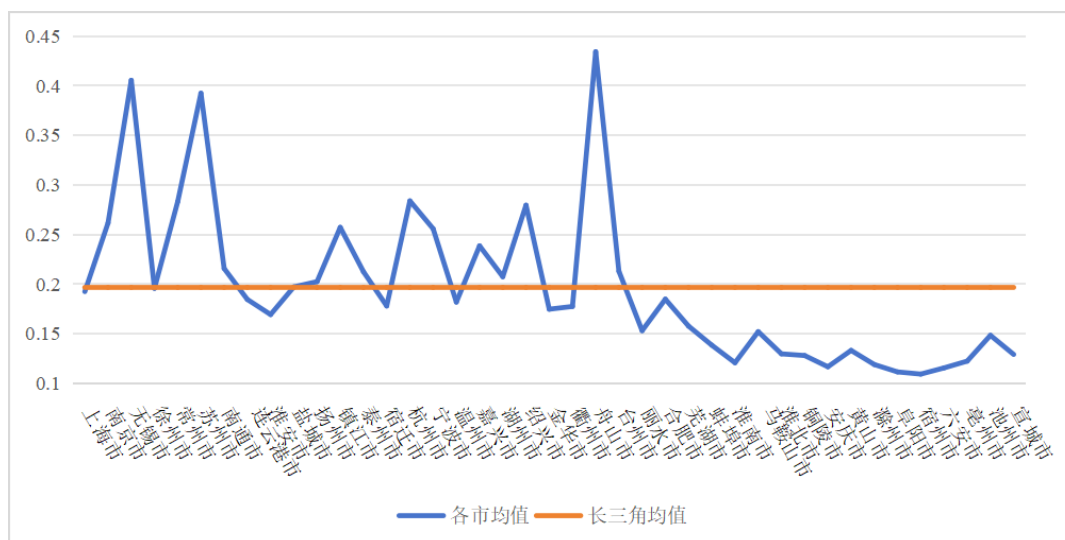
4.2.4 长三角各城市乡村振兴水平测度结果及分析

通过上述方法对长三角 41 个城市的数据进行测算, 得出各城市 2014—2021 年的乡村振兴水平得分, 由测度结果可知, 长三角各城市整体的乡村振兴水平在八年间增长较为明显, 2014 年 41 个城市的得分均值为 0.163, 2021 年得分均值为 0.237。为了更加直观的观察 41 个城市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差异, 在表 4-2 中对 8 年的乡村振兴水平取平均值, 排名结果如表 4-2 所示:

表 4-2 长三角各城市 2014-2021 年乡村振兴水平均值排名

排名	城市	得分	排名	城市	得分
1	舟山市	0.434	22	宿迁市	0.178
2	无锡市	0.405	23	衢州市	0.177
3	苏州市	0.392	24	金华市	0.175
4	杭州市	0.284	25	淮南市	0.169
5	常州市	0.283	26	芜湖市	0.158
6	绍兴市	0.279	27	丽水市	0.153
7	南京市	0.262	28	马鞍山市	0.152
8	镇江市	0.257	29	池州市	0.148
9	宁波市	0.256	30	蚌埠市	0.138
10	嘉兴市	0.238	31	黄山市	0.133
11	南通市	0.216	32	淮北市	0.130
12	台州市	0.213	33	宣城市	0.129
13	泰州市	0.212	34	铜陵市	0.128
14	湖州市	0.207	35	亳州市	0.122

排名	城市	得分	排名	城市	得分
15	扬州市	0.202	36	淮南市	0.121
16	盐城市	0.197	37	滁州市	0.119
17	徐州市	0.196	38	安庆市	0.117
18	上海市	0.192	39	六安市	0.115
19	合肥市	0.185	40	阜阳市	0.111
20	连云港市	0.184	41	宿州市	0.109
21	温州市	0.182			



由图 4-8 可以看出安徽省各城市乡村振兴水平 8 年间均值总体低于长三角 41 个城市 8 年间均值，而其他三个地区总体高于长三角地区均值。主要原因应为安徽整体发展状况相较于其他三个地区来说相对较为缓慢，经济发展水平有待提升，这导致农村地区相关政策和设施不够完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仍有很大进步空间。

第五章 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影响的实证分析

5.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5.1.1 模型构建

根据假设 H1 构建模型 1 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乡村振兴水平及其五个维度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以明确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力度以及对各个维度的不同效果，具体模型如下所示：

$$Rural_{i,t} = \beta_0 + \beta_1 Dif_{i,t} + B_2 Controls + \delta_t + \varphi_i + \varepsilon_{i,t} \quad (5.1)$$

其中 $Rural_{i,t}$ 为各城市 i 在 t 年的乡村振兴及其五个维度的发展水平； β_1 为探究的 $Dif_{i,t}$ 对 $Rural_{i,t}$ 的影响系数； $Dif_{i,t}$ 为各城市 i 在 t 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B 为待估向量组； $Control_{i,t}$ 表示相关控制变量； $\varepsilon_{i,t}$ 代表模型未考虑的其他因素。

根据假设 H2 对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支持作用是否存在门槛效应进行研究，借鉴 Hansen（2000）^[53]提出的研究方法构建模型 2，具体模型如下所示：

$$\begin{aligned} Rural_{i,t} = & \beta_0 + \beta_1 LRural_{i,t} + \beta_2 Dif_{i,t}(q_{i,t} \leq \gamma_1) + \beta_3 Dif_{i,t}(\gamma_1 < q_{i,t} \leq \gamma_2) \\ & + \beta_4 Dif_{i,t}(\gamma_2 < q_{i,t}) + B_5 Controls_{i,t}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quad (5.2)$$

其中， $q_{i,t}$ 为门槛变量； γ_1 为一重门槛值， γ_2 为二重门槛值；其余参数与上文相同。

5.1.2 变量筛选与数据说明

本文选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if)作为自变量，将基于指标体系计算得出的乡村振兴指数(Rural)作为因变量。此外，分别选取城镇化率（city）、产业结构（industry）、交通便利程度（traffic）和外贸依存度（trade）作为控制变量。

城镇化率（city）是衡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理论上与乡村

振兴成正相关关系（涂丽等，2019）^[54]，这一指标通过计算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产业结构（industry）的合理性对地区社会生产和经济效益具有重要影响，从而影响乡村振兴的实现（唐文进等，2019）^[55]，用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交通便利程度（traffic）能够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戢晓峰等，2024）^[56]，本文以人均道路面积来衡量交通便利程度。贸易开放度（trade）可以对地区资源配置产生深远影响，可能促使劳动力流动，从而引发农村地区劳动力的显著减少。然而，随着贸易的发展，也可能为农村地区吸引更多资金，为乡村的繁荣提供动力，带动乡村振兴（蔡兴等，2019）^[28]，本文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 GDP 的比值来度量贸易开放程度。

5.2 实证结果分析

5.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首先使用 Stata.16 对模型中的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到的结果如表 5-1 所示。

表 5-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Rural	328	0.197	0.084	0.071	0.5
Dif	328	240.859	50.998	124.95	359.683
city	328	0.632	0.114	0.357	0.903
industry	328	0.075	0.05	0.002	0.233
traffic	328	23.902	7.362	4.11	46.4
trade	328	0.348	0.455	0.019	4.573

在乡村振兴指数方面，由上表可以看出，2014-2021 年期间长三角各城市的平均值是 0.197，最大值为 0.5，最小值为 0.071，差异化程度较大，整体乡村振兴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方面，均值为 240.859，最大值为 359.683，最小值为 124.95，各城市间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部分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还有很大进步空间。

5.2.2 相关性分析

在进行固定效应分析前，本文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5-2 所示。从

表中可以看出, 数字普惠金融 (Dif) 与乡村振兴 (Rural) 在 1%显著水平上正相关, 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会带动乡村振兴水平的提高, 这初步验证了假设 H1, 通过计算得到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在 1.48-4.03 之间, 因此可以判断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5-2 各变量间相关系数

变量	Rural	Dif	city	industry	traffic	trade
Rural	1					
Dif	0.580***	1				
city	0.750***	0.529***	1			
industry	-0.602***	-0.416***	-0.819***	1		
traffic	-0.030	-0.007	-0.421***	0.499***	1	
trade	0.680***	0.322***	0.673***	-0.717***	-0.281***	1

注: ***、**和*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下显著。

5.2.3 基准回归分析

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假设 H1 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5-3 所示, 不加入控制变量或控制变量个数变化并不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方向, 这表明二者之间相关关系较为稳定。在加入所有的控制变量后相关系数为 0.482, 即数字普惠金融每提升 1%, 乡村振兴水平提升 0.482%。

表 5-3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5)
	Rural	Rural	Rural	Rural	Rural
Dif	1.892*** (0.422)	1.001** (0.416)	0.898** (0.400)	0.897** (0.401)	0.482*** (0.166)
city		1.977*** (0.300)	2.861*** (0.342)	2.797*** (0.355)	1.237*** (0.148)
industry			0.533*** (0.110)	0.506*** (0.117)	0.071 (0.050)
traffic				0.070 (0.105)	0.019 (0.043)

续表 5-3

	(1)	(2)	(3)	(4)	(5)
	Rural	Rural	Rural	Rural	Rural
trade					0.018 (0.019)
_cons	-14.648*** (2.201)	-9.629*** (2.188)	-5.970*** (2.237)	-6.229*** (2.272)	-3.764*** (0.943)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yes	yes	yes	yes	yes
N	328	328	328	328	328
adj. R2	0.948	0.955	0.958	0.958	0.97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同。

5.2.4 分维度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五个维度之间的相关性,将产业兴旺(Rural1)、生态宜居(Rural2)、乡风文明(Rural3)、治理有效(Rural4)、生活富裕(Rural5)五个维度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5-4 所示。

表 5-4 分维度回归结果

	(1)	(2)	(3)	(4)	(5)
	Rural1	Rural2	Rural3	Rural4	Rural5
Dif	0.908** (0.401)	0.518** (0.254)	0.789** (0.317)	0.467** (0.232)	1.482*** (0.290)
city	2.816*** (0.357)	-0.907*** (0.225)	1.044*** (0.282)	2.151*** (0.325)	0.749*** (0.258)
industry	0.520*** (0.120)	-0.087 (0.076)	0.336*** (0.094)	-0.311*** (0.069)	-0.242*** (0.086)
traffic	0.069 (0.105)	0.142** (0.066)	0.002 (0.083)	0.116* (0.061)	0.110 (0.076)
trade	-0.031 (0.045)	-0.001 (0.029)	0.076** (0.036)	0.028 (0.022)	-0.034 (0.033)

续表 5-4

	(1)	(2)	(3)	(4)	(5)
	Rural1	Rural2	Rural3	Rural4	Rural5
_cons	-6.199*** (2.275)	-4.778*** (1.438)	-3.532* (1.797)	-6.818*** (1.202)	-10.167*** (1.645)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yes	yes	yes	yes	yes
N	328	328	328	328	328
adj. R2	0.958	0.783	0.805	0.950	0.959

由分维度分析结果可知，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五个维度均有促进作用，其中对生活富裕的影响最深。

数字普惠金融对 Rural1 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系数为 0.908，即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提升 1%，产业兴旺将提升 0.908%。数字普惠金融通过解决农村融资难题，降低融资成本，有效促进了乡村产业的振兴，进而推动乡村振兴的整体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 Rural2 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系数为 0.518，即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提升 1%，生态宜居将提升 0.518%。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构建现代化农业发展体系，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有效促进乡村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进而推动乡村振兴的整体进步。

数字普惠金融对 Rural3 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系数为 0.789，即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提升 1%，乡风文明将提升 0.789%。数字普惠金融的推进有助于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缓解城乡教育的不公现象，推动乡风文明的提升，进而促进乡村振兴的整体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 Rural4 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系数为 0.467，即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提升 1%，治理有效将提升 0.467%。数字普惠金融的推进有助于推动乡村建立更加完善的治理体系和现代化治理模式，加快乡村社会内生秩序的形成，进而促进乡村振兴的全面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 Rural5 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系数为 1.482，即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提升 1%，生活富裕水平将提升 1.482%。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村地区提供相匹配的金融信贷服务，有效激发了农村经济的活力，农民群体的收入有所提升，从而推动乡村振兴的全面发展。

5.2.5 内生性检验

在解决内生性问题时，本文借鉴了李牧辰等（2020）^[57]的研究方法，选用样本城市与杭州市之间的球面直线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这一选择基于两个重要的考虑因素。首先，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基于支付宝数据构建的，而支付宝正源自杭州，其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郭峰等（2019）^[58]的研究指出，距离杭州市越远，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广难度相应增加。这意味着，城市与杭州市的地理距离可以作为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在该地区普及程度的一个间接指标。其次，各城市与杭州市之间的球面直线距离并不会随着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变动而发生变化。由于城市间的距离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地理特征，不随时间改变，在实际回归分析中，本文将样本城市与杭州市的球面直线距离与数字普惠金融相乘，得到乘积项，以此作为工具变量，结果见表 5-5。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不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Wald F 值均表明模型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大于 10%水平临界值），且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结论与前文相符合。

表 5-5 内生性检验

	(1)	(2)
	Rural	Rural
Dif	1.257*** (0.239)	0.772*** (0.225)
city		1.163*** (0.142)
industry		0.067 (0.046)
traffic		0.019 (0.040)
trade		0.016 (0.017)
_cons	-8.402*** (1.250)	-5.310*** (1.236)
year	yes	yes
city	yes	yes

续表 5-5

	(1)	(2)
	Rural	Rural
Wald F	261.858	236.915
N	328	328
adj. R2	0.961	0.970

5.2.6 稳健性检验

为了能够更加全面地评估模型的稳定性和适用性，从而得出更加严谨科学的结论，本文采用以下做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由熵值法测算得出的，为了减少单一测算方法带来的误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替代熵值法对乡村振兴指数重新进行测算。用重新测算得到的乡村振兴指数（Rural6）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回归。模型的回归系数为 1.57 且结果显著，结论与前文基本一致。

表 5-6 替换被解释变量-Rural6

	(1)	(2)	(3)	(4)	(5)
	Rural6	Rural6	Rural6	Rural6	Rural6
Dif	2.008*** (0.615)	1.686*** (0.629)	1.676*** (0.627)	1.598** (0.623)	1.570** (0.623)
city		1.593** (0.736)	0.896 (0.862)	0.481 (0.871)	0.387 (0.876)
industry			-0.272 (0.176)	-0.409** (0.183)	-0.446** (0.187)
traffic				0.403** (0.164)	0.406** (0.164)
trade					0.072 (0.072)
_cons	-13.882*** (3.211)	-13.554*** (3.194)	-14.419*** (3.235)	-15.003*** (3.215)	-14.989*** (3.215)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yes	yes	yes	yes	yes
N	328	328	328	328	328
adj. R2	0.946	0.946	0.947	0.948	0.948

(2) 替换解释变量。金融科技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金融服务模式的种类, 这些模式不仅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效率和便捷性, 还使得金融服务更加个性化、精准化。这些新模式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推动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故本文采用李春涛 (2020) ^[59] 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 (Finance) 来替代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乡村振兴水平进行回归。模型的回归系数为 0.009, 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存在正向促进作用, 且结果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结论与前文基本一致, 具体结果见表 5-7。

表 5-7 替换解释变量-Finance

	(1)	(2)	(3)	(4)	(5)
	Rural	Rural	Rural	Rural	Rural
Finance	0.103** (0.048)	0.009*** (0.003)	0.009*** (0.003)	0.009*** (0.003)	0.009*** (0.003)
city		0.156*** (0.024)	0.158*** (0.028)	0.175*** (0.029)	0.173*** (0.029)
industry			0.001 (0.010)	0.008 (0.010)	0.007 (0.010)
traffic				-0.018** (0.009)	-0.018** (0.009)
trade					0.002 (0.004)
_cons	-1.974*** (0.068)	0.147*** (0.014)	0.155*** (0.058)	0.228*** (0.069)	0.222*** (0.069)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yes	yes	yes	yes	yes
N	328	328	328	328	328
adj. R2	0.957	0.972	0.972	0.972	0.972

(3) 替换模型。本文采用系统 GMM 方法构建动态面板模型来替代固定效应模型。将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滞后一期纳入模型进行估计, 发现各项系数的符号与原模型保持一致, 只是系数大小和显著性上稍有变化。进一步检验显示, 模型的 AR (2) 检验结果大于 0.1, 同时 Hansen 检验的 P 值也大于 0.1, 这表明模型中的工具变量没有过度识别问题, 因此模型的设定是合理的。

表 5-8 替换模型-系统 GMM

	Rural
L.Rural	0.750*** (0.004)
Dif	0.037*** (0.006)
city	1.156*** (0.045)
industry	0.970*** (0.059)
traffic	0.007*** (0.000)
trade	0.016*** (0.001)
_cons	-1.552*** (0.035)
N	287
AR(2)	0.182
Hansen	0.291

5.2.7 门槛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假设 H2，深入了解不同发展水平的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差异，采用门槛回归分析方法，具体结果如表 5-9 和表 5-10 所示。

表 5-9 门槛效应

门槛变量	F 值	P 值	BS 次数	临界值		
				10%	5%	1%
单一门槛	37.49**	0.0233	300	26.2208	32.1135	47.4251
双重门槛	13.93	0.3867	300	27.1633	38.9249	52.4220
三重门槛	7.12	0.6200	300	16.9104	19.1652	25.8729

表 5-10 门槛估计结果

门槛变量	门槛估计值	95%置信区间
γ_1	5.1671	[5.1587,5.1798]

检验结果表明，单一门槛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而双重和三重门槛效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P 值大于 0.1）。因此，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

兴之间仅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具体门槛值为 5.1671，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 H2。

表 5-11 门槛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估计值	标准误	t 值	P 值
city	1.549***	0.274	5.650	0.000
industry	0.150**	0.070	2.150	0.038
traffic	0.043	0.063	0.680	0.499
trade	-0.020	0.016	-1.270	0.212
Dif≤5.1671	0.484***	0.082	5.900	0.000
Dif>5.1671	0.466***	0.081	5.790	0.000
_cons	-3.263	0.663	-4.920	0.000
N	328			
R ²	0.826			

根据表 5-11 的门槛回归结果，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因门槛值的存在而被划分为两种不同情况。当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低于 5.1671 时，其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一旦越过此门槛值，尽管其促进作用仍显著，但系数有所降低。这显示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非线性影响，即随着其发展至一定水平，尽管仍具推动作用，但效果会相对减弱。这体现了数字普惠金融的门槛效应。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在前期大量阅读前人研究成果以及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相关知识积累下，首先阐述了数字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的基本概念，随后梳理了国内外研究成果，形成了文献综述。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理论角度出发，深入剖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然后从五个维度测度得到长三角 41 个城市乡村振兴指数并使用统计分析法介绍二者的发展现状，最后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2014-2021 年间，长三角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特别在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方面，其增长势头明显超过数字化程度。三省一市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状况上存在差异，上海 8 年间一直处于领先，浙江和江苏次之，安徽处于落后地位。通过对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测度及对结果的分析可知，2014-2021 年，长三角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整体有所改善。此外可以发现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整体乡村振兴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对 8 年的乡村水平取均值后，江苏排名第一，浙江和上海次之，安徽低于上述三个地区，发展水平稍弱。

第二，对 2014-2021 年长三角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指数进行回归分析（模型 1）后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与乡村振兴及其五个维度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并逐步引入控制变量进行验证，确认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乡村振兴指数之间的显著正相关性。分维度回归分析得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乡村振兴五个维度均存在正向影响。

第三，对 2014-2021 年长三角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指数进行门槛回归分析（模型 2），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具体来说，在未达到第一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系数较高（0.484），当越过这一门槛后，影响系数略有降低（0.466）

6.2 研究建议

根据实证研究结果，为促进我国乡村振兴水平稳健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强化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计算机、互联网等数字化基础设施为金融机构开展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提供了基础条件，同时也为数字普惠金融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重要基石。因此，政府和电信运营商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增加对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积极扩大农村宽带、4G 和 5G 网络的覆盖面积，持续推动互联网服务的降费提速，不断优化服务质量，并积极推广智能移动设备的使用。

第二，完善农村金融征信体系建设。完善的农村征信体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农民信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对解决农民的贷款问题，预防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都能起到促进作用。信用体系的滞后，会严重制约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利于乡村振兴水平的发展。因此为推进农村金融征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继续发挥其主导作用，健全农村信用信息的征集机制，并加快推进农户信用信息档案的收集工作。同时，通过举办多样化的信用活动，提高农村居民的诚信意识，为征信体系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三，加强对农村地区金融知识的宣传。乡村振兴战略的成功实现必然需要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持，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开始接触并参与到金融投资活动中，这为他们增加了收入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风险。较高的金融素养可以帮助农村居民识别并及时发现金融投资活动中的风险，避免给个人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损失。政府和金融机构应当共同努力拓宽投资信息来源，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居民的风险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

参考文献

- [1] 周小川.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N]. 人民日报, 2015-11-25(06).
- [2] 邢乐成, 赵建. 多维视角下的中国普惠金融:概念梳理与理论框架[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34(01): 164-172+198.
- [3] William E. The white man's burden:Why the west's efforts to aid the rest have done so much ill and so little good[M].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6: 274-310.
- [4] 星焱. 普惠金融:一个基本理论框架[J]. 国际金融研究, 2016, (09): 21-37.
- [5] 贝多广, 李焰. 数字普惠金融新时代[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3-20.
- [6] 宋晓玲. 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J]. 财经科学, 2017, (06): 14-25.
- [7] Shiller R J. Reflections on finance and the good socie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103(03): 402-405.
- [8] Ozili P K.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e on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stability[J]. Borsa Istanbul Review, 2018, 18(4): 329-340.
- [9] 尹应凯, 侯蕤.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逻辑、国际经验与中国贡献[J]. 学术探索, 2017, (03): 104-111.
- [10] 陈婵姘, 岳玉珠.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研究[J]. 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18, (06): 111-120.
- [11] 邱兆祥, 向晓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8, (01): 5-9.
- [12] 董玉峰, 陈俊兴, 杜崇东. 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理论逻辑、模式构建与推进路径[J]. 南方金融, 2020, (02): 64-73
- [13] 任海军, 王艺璇.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西部数字普惠金融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9(05): 40-48.
- [14] 陈婕. 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J]. 经营与管理, 2021, (06): 153-158.
- [15] 任太增, 殷志高.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J]. 管理学报, 2022, 35(01): 23-35.

- [16] Johnson T G.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finance:Keys to rural revitaliza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89, 71(5): 1324-1326.
- [17] Kawate T.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eform of rural organizations in contemporary rural Japan[J]. Journal of Rural Problems, 2005, 40(4): 393-402.
- [18] Ojo K A, HAIRUL B N I. Host's supports for voluntourism:A pragmatic approach to rural revitalization[J]. Australian Journal of Basic and Applied Sciences, 2013, 7(4): 393-402.
- [19] Mclaughlin K. Infectious disease:Scandal clouds China's global vaccine ambitions[J]. science, 2016, 352(6285): 506.
- [20] Liu Y, Li Y. 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J]. Nature News, 2017, 548(7667): 275-277.
- [21] 张海鹏, 郜亮亮, 闫坤.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创新和实现路径[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 (11): 2-16.
- [22] 马义华, 曾洪萍. 推进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和战略重点[J]. 农村经济, 2018, (06): 11-16.
- [23] 黄祖辉. 准确把握中国乡村振兴战略[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 (04): 2-12.
- [24] 王修华. 乡村振兴战略的金融支撑研究[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9, (03): 35-43, 157.
- [25] 谭燕芝, 李云仲, 叶程芳. 省域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评价及其耦合协同分析[J]. 经济地理, 2021, 41(12): 187-195+222.
- [26] 王姗姗, 段娟娟, 魏遥. 收入不平等、乡村振兴与农民幸福感[J]. 统计与决策, 2022, 38(11): 16-20.
- [27] Beck T, Brown M. Use of banking services in emerging markets-household-level evidence[J]. Cepr Discussion Papers, 2011, 89(8475): 1-39.
- [28] 蔡兴, 蔡海山, 赵家章. 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J]. 当代经济管理, 2019, 41(08): 91-97.
- [29] 李季刚, 马俊.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关系的实证[J]. 统计与决策, 2021, (10): 138-141.
- [30] 李丽丽. 共同富裕下普惠金融、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J]. 商业经济研究, 2022, (08): 178-181.
- [31] 庞凌霄. 数字普惠金融、农村减贫与乡村振兴[J]. 统计与决策, 2022, 38(10): 57-62.
- [32] 陈亚军.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J]. 现代经济探讨, 2022, (06): 121-132.
- [33] 周林洁, 韩淋, 修晶.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助力乡村振兴:基于产业发展的视角[J]. 南方金

- 融, 2022, (04): 70-78.
- [34] 傅巧灵, 李媛媛, 赵睿. 数字普惠金融推进脱贫地区乡村全面振兴的逻辑、问题与建议[J]. 宏观经济研究, 2022, (06): 49-56.
- [35] 田霖, 张园园, 张仕杰.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系统 GMM 及门槛效应的检验[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10): 25-38.
- [36] 孟维福, 李莎, 刘婧涵等.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研究[J]. 经济问题, 2023, (03): 102-111.
- [37] Mckinnon R.I.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M].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3: 47-56.
- [38] Shaw E.S.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127-154.
- [39] Leyshon A, Thrift 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UK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in the 1990s:A reversal of fortune[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3, (3): 223-241.
- [40] Leyshon A, Thrift N. Access to financial services and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withdrawal: problems and policies[J]. Area, 1994, (3): 268-275.
- [41] Leyshon A, Thrift N. Geographies of financial exclusion:financial abandonment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95, (3): 312-341.
- [42] Rogaly B, Fisher T. Poverty,social exclusion and microfinance in Britian[M]. London: Oxfam, 1999: 7-184.
- [43] 李文瑞, 石建平, 荆勤忠等.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 助力甘肃乡村振兴[J]. 发展, 2021, (05): 26-29.
- [44] 程秋旺, 许安心, 陈钦. “双碳”目标背景下农业碳减排的实现路径:基于数字普惠金融之验证[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43(2): 115-126.
- [45] 陈平, 王书华, 王小腾. 数字普惠金融对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基于老龄化的视角[J]. 经济问题, 2022, (11): 36-43.
- [46] 王正新, 琚悦琦.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282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金融发展, 2021, (02): 1-13.
- [47] 李晓园, 刘雨濛.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促进农村创业?[J]. 经济管理, 2021, 43(12): 24-40.
- [48] 朱一鸣. 中国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农民增收效应研究[D]. 辽宁: 辽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20.

- [49] 毛锦凰, 王林涛.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基于省域层面的实证[J]. 统计与决策, 2020, (19): 181-184.
- [50] 张挺, 李闽榕, 徐艳梅.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19, (06): 90-103.
- [51] 李长亮, 李昊儒, 周美秀.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J]. 统计与决策, 2022, (22): 66-70.
- [52] 蔡雪雄, 苏小凤, 许安心. 基于 AHP-熵值法的乡村生态宜居评价研究:以福建省为例[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09): 86-94.
- [53] Hansen B. Sample splitting and threshold estimation[J]. Econometrica, 2000, 68(3): 575-640.
- [54] 涂丽, 乐章. 城镇化与中国乡村振兴:基于乡村建设理论视角的实证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18(11): 78-91.
- [55] 唐文进, 李爽, 陶云清.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 283 个城市的经验证据[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19, 34(06): 35-49.
- [56] 戢晓峰, 李明骏, 陈方等. “三区三州”交通驱动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及发展模式研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4, 38(01): 31-39.
- [57] 李牧辰, 封思贤, 谢星.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影响研究[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0(03): 132-145.
- [58] 郭峰, 王靖一, 王芳等. 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J]. 经济学(季刊), 2020, 19(04): 1401-1418.
- [59] 李春涛, 闫续文, 宋敏等. 金融科技与企业创新——新三板上市公司的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 (01): 81-98.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1]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以江苏省各县及县级市为例，已见刊。
- [2] 研究报告：《鸠江区财政运行绩效评价报告》，2022，芜湖市鸠江区财政局。

致谢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我在安工程金融专硕的学习生涯即将画上句号。回首这段宝贵的时光，我深感收获颇丰，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激。

首先，我要衷心感谢我的导师方永胜教授。在我整个研究生阶段，您不仅以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为我指明了学术方向，更以高尚的师德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为我树立了人生的榜样。您的每一次悉心指导，每一次耐心解答，都使我受益匪浅。您的教诲，我将铭记于心，终身不忘。

同时，我要感谢金融专硕的所有任课老师。是您们用智慧和汗水，为我们构筑了金融学的知识殿堂。您们的每一堂课，都使我深受启发，对金融学的理解更加深入。您们的辛勤付出，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还要由衷感谢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与论文评审的各位专家和教授，人生有涯，学海无涯，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我将更加努力，以期取得更大成果回报学校和社会。

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同学们。我们一同度过了这段难忘的学习时光，共同面对挑战，共同成长。你们的陪伴和支持，让我在学习的道路上不再孤单。我们之间的友谊，将成为我人生中宝贵的财富。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是您们的无私奉献和坚定支持，让我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和研究中。你们的肯定，是我前进的动力和源泉。

在此，我谨向所有关心、帮助和支持过我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将带着这份感激和收获，继续前行，在未来的道路上不断追求进步，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努力拼搏。

2024 年 5 月 28 日